



主 编

叶 朗 / 向 勇

北大

文化产业

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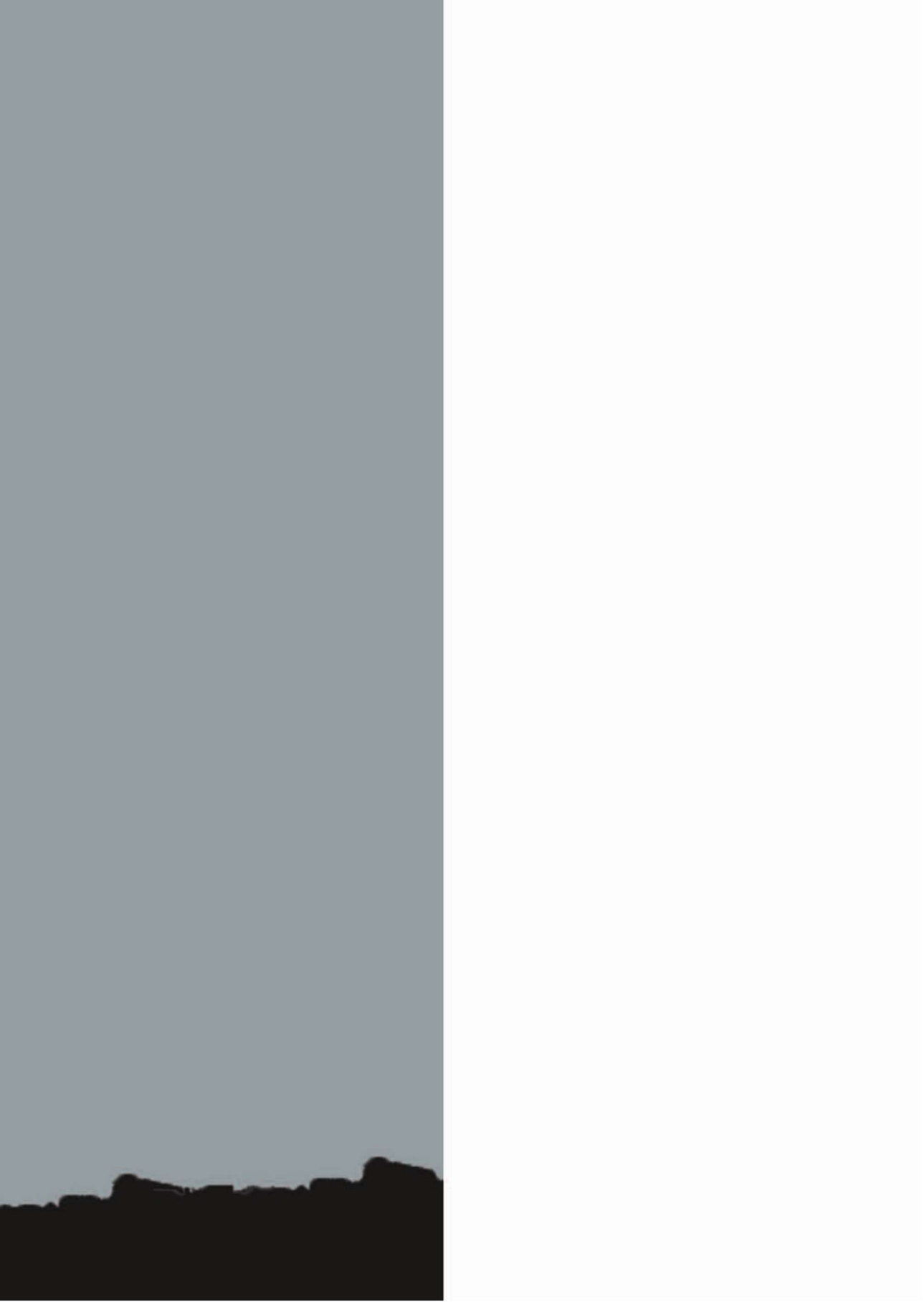
2019年
北大
文化产业
评论

Peking
University
Cultural
Industries
Review

2019年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主 编

叶 朗 / 向 勇

2019年
北大
文化产业
评论

Peking
University
Cultural
Industries
Review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2019 / 叶朗, 向勇主编.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20.1

ISBN 978-7-5075-5236-2

I. ①北… II. ①叶… ②向… III. ①文化产业—研究 IV. ①G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6692号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 2019

Běidà Wénhuàchǎnyè Pínglùn 2019

主 编: 叶 朗 向 勇

责任编辑: 杨艳丽 王晓冰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s.com.cn>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10 编辑部 010-58336191

发行部 010-58336253 583362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5236-2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编委会

主 编

叶 朗 向 勇

执行主编

李晓唱

编辑

刘结成 钮沐联 汪 卷 闫小青 史艺璇

专家委员会委员（下列中文姓名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川（北京大学）

尹 鸿（清华大学）

李天铎（中国台湾实践大学）

李向民（南京艺术学院）

何庆基（香港中文大学）

李 炎（云南大学）

花 建（上海社会科学院）

张胜冰（中国海洋大学）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

范 周（中国传媒大学）

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

顾 江（南京大学）

贾旭东（中国传媒大学）

高宏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徐秀菊（澳门理工学院）

彭 锋（北京大学）

魏鹏举（中央财经大学）

Boyi Li（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Peter Williamson（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编者按

2019 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回顾过去 70 年新中国文化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文化产业领域的学者也在思考，步入下一个 70 年之际，文化产业的新征程会给日益崛起的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为此，2019 年 1 月 5 日至 6 日，以“新征程：文化自信与融合创新”为主题的第 16 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论坛广邀文化产业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共聚燕园，通过多元对话促进文化创新和产业融合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关怀，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入探索如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力求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集思广益。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得到沿线国家积极响应。近两年是“一带一路”构想逐步得以践行的重要年份，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数字创意与文化创新”为主题的北京大学第八届文化产业国际博士生论坛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在“一带一路”的构想倡议、时代语境和技术背景下，探讨如何理解、阐释、评价和推动文化产业领域的创新与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问题。以上两次会议中的优秀论文成为本刊的主要稿件来源，此外，本刊还广发《征稿启事》，吸纳了来自不同研究领域、拥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投稿，共囊括优秀论文 18 篇。

为加速推动《北大文化产业评论》成为国际文化产业领域中知名学者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阵地，并入选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大文化产业评论（2019）》在规范投稿要求、完善审稿程序的基础上，开始将主题栏目固定化，并计划今后结合当年文化产业领域的研究动向和发展趋势设置研究专题。本刊将收录的稿件统筹于理论视野、前沿观察、产业动态、区域热点这四个固定栏目之下，有侧重点地展现出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文化产业研究视点。

在理论视野方面，所选论文涉及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既有立足于我国目前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从宏观层面入手，研究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和优化路径的论文；也有从全球化语境和融媒体视域出发，将时代背景和行业特点结合起来，讲述品牌文化和文化产业叙事模式的研究。

在前沿观察栏目中，本刊探讨的话题包括艺术众筹、大数据电影营销、敦煌文化传承与创新、奢侈品战略创新等。众筹平台不仅为项目发起者提供了资金来源方式，同时项目发起者也可以借助平台中体现的 Web 2.0 因素进行营销活动，如进行市

场测试、市场反馈、预售等，给艺术产品提供资金来源与营销活动的新思路；“掌握”数据似乎还不能左右最终的胜局，面对巨量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机的处理、适时且个性化的应对，方能找到切实的制胜之道，“大数据”及“数据可视化”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能产生深刻而决定性的影响；当代敦煌在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上做出了许多开拓性尝试，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敦煌文化在创新性发展上应注重守正创新、深挖敦煌文化内涵，适应时代需求、拓宽文化展示手段，加强文化传播、创新敦煌美育形式，树立世界眼光、讲好敦煌文化故事；未来奢侈品牌的发展已不再是简单依托设计与创意的结合，而是需要通过战略创新的调整将品牌文化价值变为可传播的文化标签，以此传递品牌的精神内涵，才能持续赢得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

在产业动态上，学者多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阐释某个行业门类的最新动向。通过研究清明上河园沉浸式文化旅游开发的效益与经验，论证沉浸式开发作为一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式的优越性，提出文化旅游资源沉浸式开发的基本原则和优化方向，指出文化旅游资源的沉浸式开发为城市文化建设、特色小镇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开创新蓝海的可能；探讨国家图书馆文创业务对于整个图书馆文创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图书馆文创的发展不应该只考虑经济效益，基于国家图书馆的事业属性和文化教育使命，应该注意平衡发展图书馆文创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港式“主旋律”电影的成功是正确定位影片类型、精准把控受众心理，同时明确传播者自身定位的结果。港式“主旋律”题材也通过成功平衡电影的艺术水准、商业价值和宣传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在区域热点中，所选论文多以某个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来反映相关问题。韩国全南谷城郡将“沈清”作为地区文化开发的象征性资源后，灵活利用了谷城郡管辖区域内的缘起传说“元洪庄的故事”，并以此牵线搭桥与中国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巴渝地区作为“一带一路”西部重要的起始区域之一，其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成为研究者最好的案例。所选文章从客观与主观的角度，结合共演思维理论，构建文化产业维度与要素综合影响评价体系模型，可为“一带一路”区域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提供新的评价方法和思考路径。

本刊致力于把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正确的文化导向传播给广大受众，并期待文化产业与其他行业能够产生更具创造性的良性互动。我们也真诚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关注和支持本刊。

目 录

理论视野

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及优化路径·····	2
全球化语境下品牌文化的民族性·····	15
融媒体视域下文化内容所需的讲故事模式研究·····	23

前沿观察

Web 2.0 的特征在艺术众筹平台营销活动中的应用探究	
——以乐童音乐众筹平台为研究对象·····	36
大数据及数据可视化对当代中国电影营销的若干影响·····	54
文化自信视野下敦煌文化传承与创新路径研究·····	70
奢侈品牌战略创新模式的思考	
——基于古驰（Gucci）等品牌的对比分析·····	80
基于服务设计思维的文创产业跨界基因重组与融合·····	93
新文创生态：弥合与共生·····	104

产业动态

博物馆的文创开发机制及功能·····	114
沉浸式文化旅游景区开发体系与机制研究	
——以开封清明上河园为例·····	132
传统手工艺进入日常生活的路径：从文创设计到文化 IP 打造·····	150
卷帙浩繁，跃然纸上：国家图书馆文创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160
动画或为戏曲电影美学冲突提供解决方案·····	169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全球化想象	
——从传播学的视角浅析港式“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策略·····	177

区域热点

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策略

——以越剧《沈清传》的叙事转换为中心…………… 190

共演思维视角下“一带一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评价方法研究

——以巴渝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为例…………… 204

“一带一路”背景下开心麻花多场域发展模式探究…………… 224

《北大文化产业评论》征稿启事…………… 236

理论

视野

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及优化路径

郑丽娥^①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 北京 100089)

【内容摘要】文化产业发展过程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中发生的。制度因素贯穿于文化产业形成以及发展的整个阶段,是促进文化产业形成、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文化产业的规范、有序发展客观上需要制度的引导、管理和扶持。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文化产业发展势必要求制度主体能不断地适应新的挑战,需要制度的不断创新来最大程度地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关键词】文化产业;制度环境;文化产业化;制度创新

The System Environment and Optimzation Path of 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ment

Zheng Li'e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takes place in a certai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arrangement. Institutional factors run throug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ge of any cultural industry, which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standard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needs the guidance of institution objectively. In the era of the whole networ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bound to require the institutional subject to constantly adapt to new challenges and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to maxim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① 郑丽娥,女,本科,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法规与政策、“一带一路”投融资等。

Key words : Cultural Industry ;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 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也要求“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大,如何规避或化解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推动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文化产业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考虑到技术和制度是实现文化产业化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环境是文化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主要针对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展开研究,明晰制度如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并结合已有研究,探究文化产业的优化路径,以促进文化产业制度的创新及产业经济的创新性发展。

二、理论基础

(一)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应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分析法去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产物,概括地说,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科斯、德姆塞茨、诺思和威廉姆森等人为代表,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其独有的分析工具——交易成本;同时依托交易成本概念,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揭示制度的起源与演化、制度的性质与功能,以及各种制度具体的经济后果。

最早提出“新制度经济学”这个概念的是奥利弗·威廉姆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制度本身,以及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主要就制度的起源、形成及变迁,研究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以及政府、国家等制度。制度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经济学家艾克伦德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源于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将创造和改变诸如产权结构、法律、契约、政府形式等制度。这些制度和组织将提供激励或建立成本和收益,这些激励或成本与收益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将支配经济活动和经济增长。又如经济学家科斯所说,标志当代制度经济学特征的应该是它所探讨的问题是那些现实世界提出来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主义者”的学者通常关注四个研究领域:第一,交易费用和产权;

第二, 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 第三, 数量经济史 (一般是以一种制度的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为基础); 第四, 认知、意识形态以及路径依赖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四条主线。第一, 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它起源于科斯的思想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 主要由阿尔奇安、张五常、哈特等学者发展, 强调契约是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 理性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行为决定了制度的形式和效果。第二, 交易费用经济学。它起源于科斯和康芒斯的理论, 主要由威廉姆森发展, 同样强调契约是经济制度的基本单位, 但和契约经济学不同, 它假定经济当事人面临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约束, 这意味着不存在最优的制度安排。第三, 立宪经济学。它起源于维克赛尔, 主要由布坎南创立和发展。立宪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类似, 强调契约在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地位, 假定经济人具备有限理性, 重视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和秩序的形成与演变。第四, 制度演进理论。它起源于马歇尔、凡勃伦、米切尔、哈耶克等人, 由阿尔奇安、纳尔逊、温特、维特等学者发展, 强调制度如同生物进化论一样, 有一个自然演进过程, 由于人的无知, 制度无法被精确设计, 从本质上说, 制度更多的是对环境的适应。

(二) 制度

1. 制度的基本概念

引入制度变量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取得的新进展。其基本思想是, 制度是内生的, 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制度经济学的创建者凡勃伦是旧制度经济学中最早给制度下定义的人。1899年, 他提出: “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制度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凡勃伦突出强调了经济生活中习惯行为的重要性, 他将社会制度与个人思想意识联系起来, 认为人类行为会影响制度的构建。而旧制度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康芒斯认为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集体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很广, 从无组织的习俗到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都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在康芒斯看来, 制度无非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 也就是说, 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种组织以及组织内部的业务规则。而舒尔茨与康芒斯的制度定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舒尔茨在1968年阐述了自己对制度的理解, 他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艾尔森纳则将制度定义为一种决策或行为准则, 后者控制着多次博弈中的个人选择活动, 进而为与决策有关的预期提供基础。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下定义最多的, 他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 更规范地讲, 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在青木昌彦看来, 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制度以一种自我实施的

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几乎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产生出来。换句话说，制度就是博弈规则。结合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总的来说，制度有两层基本含义：第一，制度是行为规则，决定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选择的行动方式；第二，制度是人们结成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等组织或体制，决定着一切社会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框架。

2. 制度的作用

（1）制度对人类行为的作用。对于制度与个人之间的因果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过程的舞台上，制度与人类行为互补与对比，永远相互塑造。”海纳曾提出，制度起因于个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所做的努力，通过限制人们的有效选择使行为可预测，从而减少不确定性；没有制度就没有秩序、没有社会、没有经济、没有国家组织。概而言之，制度能塑造个人，从而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在塑造个人方面，一般来说，软性制度是通过文化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等媒介间接对个人进行塑造，比如，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各自信徒的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诸如法律政策等强制制度，一般是直接对个体及个体进行的活动做出规定。在经济活动中，制度能有效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提高合作能力和竞争能力，并通过规范竞争规则促进创新竞争，创造一个良性的交往环境。在扩展人的有限理性方面，由于人类受客观上的不确定与主观上的智力资源稀缺的双重约束，理性是有限的；加上机会主义倾向等行为特征经常会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因此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制度有助于为了长期有效协作而抑制人们的固有本能，能降低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加互利合作的习惯，达到抑制这种本能性机会主义的目的。同时，制度能够使他人的行为变得更可预见，为社会交往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制度还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帮助我们减少对信息的依赖。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是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它们节省了稀缺的认知资源。从本质上说，制度的作用是减少人们相互交往的不确定性预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

（2）制度对经济行为的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来，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诺思认为，制度框架将勾勒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方向。这一方向将是该社会长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制度对技术进步具有激励作用。诺思特别提出了两个引起技术快速变化的原因——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这两种导致技术变化的原因从本质上来说至少（或至少部分）具有制度特征。制度框架所建立的激励结构在规范技能与知识的形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到现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原因。其次，制度能降低交易费用。制度是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经过多次博弈而达成的一系列契约的综合。经济活动具有高度复杂

的相互关联性,加上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行为的难以预测性,这些都不利于经济主体间的合作与交往。制度的基本作用之一就是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有效的制度能通过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正如科斯提出的,企业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最后,制度能将外部性内部化。外部性是指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许多外部性都与产权制度有关,产权界定不清晰是外部性存在的根源。建立排他性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转变。建立排他性产权制度的过程也就是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

三、文化产业形成的制度基础

当有关文化产品的生产超越了个人生产的范畴而成为社会集体性共同行为、由个体向集体转化时,单一的力量体系向集合的力量体系转化并实现产品的价值交换,就产生了文化产业。因此,文化产业是一种高风险、高投产成本以及低复制成本的产业。在不稳定的市场中,由于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以及潜在机会主义倾向和信息不对称等导致交易成本的产生。正确的制度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为文化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和制度环境。

政府非管制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是文化产业化的一个主要制度供给。与文化相关的内容由于涉及“精神”特质,通常被认为是上层建筑的东西。文化领域在经济化以及产业化的过程中,势必造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各国在采取文化相关的措施时容易在市场准入、市场经营和市场开拓等方面设置种种障碍,无法使文化产业进行规模扩张和行业整合。整体而言,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然而,随着“物质”产业的成熟和知识经济的到来,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瞩目和争夺的焦点,并因其经济属性而逐渐成为各国的支柱性产业。以我国为例,自1992年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以来,适时的文化体制改革开始推动我国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经将“传播与文化产业”确定为上市公司的13个基本门类之一,2005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可见,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外部的推动力在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而产权制度的完善是文化产业化的另一个制度供给。明晰的产权制度有利于交易的确定和进行、产品和产业的创新以及市场效率的提高等。对文化产业来说,除了基本的产权制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知识产权制度。这是因为文化产业

的核心产业属于知识产业,这类产业的核心要素是知识。创新是文化产业的生命之源,保护创新者利益是鼓励创新的主要手段。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人的智力劳动成果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从1474年威尼斯共和国诞生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到1994年TRIPS协议的正式签约生效,从最初的国内法到目前的国际法,从中世纪由地方官吏和封建君主通过颁布敕令授予的“特权”到现代国家以法律形式将“特权”制度化,进而使知识产权成为依法产生的“法权”,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使企业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一种特定的垄断权,减少了文化产业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所有者获得成本补偿和巨额利润,有利于建立更稳定、更持久的制度化的激励机制,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扩张和发展。

四、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制度因素贯穿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影响着一国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制度环境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通过制度变迁形成动态发展的路径。下面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为例进行分析,借鉴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文化产业层级的划分,将制度环境分为核心层制度环境、外围层制度环境、延伸层制度环境(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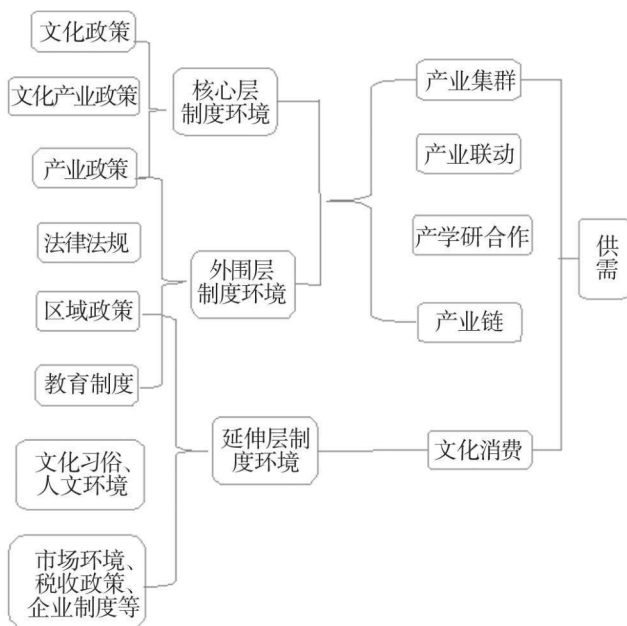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产业的制度环境

核心层制度环境主要由文化政策、文化产业政策以及部分产业政策组成。核心层制度环境从国家层面出发,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宏观的制度环境。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到今天,文化政策以及针对性的文化产业政策对于文化产业发展起着引导性的作用。我国文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文化和文化经济的大势所趋。因此,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政策制定以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为最高利益作为制度取向,致力于推动文化产业市场化,推动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扩大文化对外开放和交流。为了将文化创意、文化价值、文化意蕴、文化传统创造性地运用和体现在各行各业以及国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推动文化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和渗透,国家文化产业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从《国家“十二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到文化部制定出台的《“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再到《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这些政策都充分体现了旨在促进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的政策价值取向,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

外围层制度环境包括部分产业政策、法律法规、区域政策和教育制度。外围层制度与核心层制度环境共同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的产业集群、产业联动以及产业链的形成。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文化建设部分提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完善文化产业相关政策,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为我国文化产业制度环境发展确定了宏观方向。自此,中央和地方相继完善文化产业制度,地方政府贯彻落实中央相关政策,开始运用立法手段来保护和规范文化产业的运作。从2009年3月到2012年5月,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扶持培育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合作协议》《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等20余个专门或涉及文化产业政策的规范性文件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延伸层制度环境由区域政策、教育制度、文化习俗、人文环境、市场环境、企业制度等构成,通过促进文化消费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一般与文化产业直接相联系的政策文件之外,一些相关法律政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以及文化领域未来的相关发展规划等制度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消费,进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此外,政府的相关工作在一